

# 極權的誘惑： 民主與獨裁之爭中的國家主義

• 高力克

**摘要：**國家主義是一種源自德國的反啟蒙的後發展政治理論。在1930年代的中國，日寇侵凌的危機、歐洲極權的誘惑和追求富強的悲情，刺激了極權國家主義思潮的興起，這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有集中的體現。「新獨裁派」的國家主義是一個現代意識形態大雜燴，它熔極權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發展主義、民粹主義於一爐，因而對危機中的思想界極具誘惑力。蔣廷黻、吳景超膜拜鐵腕威權和秩序至上的保守主義，錢端升、丁文江倡言以獨裁的極權國家推動工業化的發展主義以及大眾福利高於少數人自由的民粹主義，都表徵着國家主義者對中國問題的多重回應。這些一向被視為「英美派」的新獨裁派是一群忠誠的愛國者，他們以往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更多是工具性的，而缺乏對其內在價值的信仰。對這些信奉國家利益至上的知識份子來說，民主與獨裁都是手段，而國家富強才是終極目的。極權主義的誘惑，最易俘獲後發展國家知識份子渴求富強的民族主義激情。

**關鍵詞：**國家主義 極權主義 民主 新獨裁派 富強

晚清以降，在百年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歷史語境中，國家主義思潮不絕如縷。中國現代化是一個古老的東方帝國因應西方挑戰的文明調整，國家富強成為危機中的中國回應西方軍事經濟壓力的基本訴求。當古老的中華帝國被西方勢力強行捲入現代文明的大潮之中，列強侵凌的屈辱、分崩離析的內亂、追求富強的悲情，均成為中土滋生國家主義的溫牀。無論晚清民國救亡圖存的危機，抑或轉型中國經濟騰飛的崛起，都可以成為國家主義發酵的土壤。

## 一 國家主義的挑戰

國家主義 (statism) 是一種崇尚國家至上的現代意識形態。其國家崇拜的理念顛覆了中世紀世俗國家屈從於上帝的基督教國家觀，亦與啟蒙運動基於自然法理論的契約主義國家觀大異其趣。國家主義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德國，它以費希

特 (Johann G. Fichte) 的國家學說肇其端，以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的國家理論集大成。因此，黑格爾被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卡西爾 (Ernst Cassirer，又譯卡西勒) 稱為「普魯士國家的哲學家」<sup>①</sup>。黑格爾的國家理論有如下要旨：

- 一、國家神聖論。「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國家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國家是神的意志，也就是當前的、開展成為世界的現實形態和組織的地上的精神。」<sup>②</sup>
- 二、國家有機體論。「國家是機體」，國家機體中「各個環節的這種理想性正像機體的生命一樣。生命存在於每個細胞中。在一切細胞中只有一個生命，沒有任何東西抵抗它」。「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sup>③</sup>
- 三、王權至上論。「王權，即作為意志最後決斷的主觀性的權力，它把被區分出來的各種權力集中於統一的個人，因而它就是整體即君主立憲制的頂峰和起點。」政府決策由諮議機構而非君主負責，「君主特有的尊嚴，即最後作決斷的主觀性，則對政府的行動不負任何責任。」<sup>④</sup>

國家主義是一種崇尚國家至上的現代意識形態。其國家崇拜的理念顛覆了中世紀世俗國家屈從於上帝的基督教國家觀，亦與啟蒙運動基於自然法理論的契約主義國家觀大異其趣。國家主義以費希特的國家學說肇其端，以黑格爾的國家理論集大成。

黑格爾的國家理論表徵着啟蒙運動以後歐洲思想的重要轉折。卡西爾在《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ate) 一書中對黑格爾國家理論有深刻的批判。卡西爾指出，黑格爾的國家理論是一種全新的絕對論。其「國家是自主的絕對精神，它不承認甚麼抽象的善與惡」的觀點，是對以往一切價值的重估和顛覆，按此觀點，不再有任何對國家的道德約束，道德只適用於個人意志，而不適用於普遍的國家意志，國家唯一的義務是自保。由此，黑格爾把個人視為世界歷史之皮影戲中的木偶，在他看來，個人無非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黑格爾對「權力的真理」的崇拜，「包含着從未被任何政治家或哲學家提過的法西斯主義的最明白無誤的綱領。」<sup>⑤</sup>

在卡西爾看來，黑格爾的國家學說是和啟蒙運動相對立的。「黑格爾的政治理論是兩大思想潮流的分水嶺。它標誌着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轉折。它處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分界線上。」<sup>⑥</sup>卡西爾強調指出，雖然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和現代極權主義國家理論存在着不容混淆的重要差別，但黑格爾充滿自相矛盾的哲學體系往往使其理論走向反面：「黑格爾的悲劇命運就在於，他無意中釋放了曾在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最非理性的力量。沒有別的哲學體系像黑格爾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是『存在於塵世的神性理念』——那樣為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做過這麼多的準備。」<sup>⑦</sup>

在黑格爾之後，十九世紀德國興起了一股經濟國家主義思潮，經濟學家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國民經濟學主張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和貿易保護主義，財政學家瓦格納 (Adolf Wagner) 倡言公共財政和政府活動擴張 (通稱「瓦格納法則」)，代表了一種與斯密 (Adam Smith) 理論相對立的崇尚政府干預之統制經濟的普魯士經濟國家主義。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推行富國強兵的富強主義，則以武力強權促進了德意志帝國的崛起。

黑格爾的國家神聖論、國家有機體論、王權至上論，李斯特和瓦格納反市場的統制經濟主張，俾斯麥追求富國強兵的富強主義，共同構成了德意志國家主義的基本要素。在十九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崩解後，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

面臨從中世紀普世宗教體系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時代。法國欺凌的民族危機、小邦林立的分裂局面、經濟落後的貧弱國勢、文化優越的自尊悲情，均是孕育德意志國家主義的天然土壤。

作為一種後發展政治理論，國家主義促進了十九世紀德國的民族統一和經濟發展，讓德國得以後來居上趕超西歐而強勢崛起；但它亦孕育着一種火山爆發般的危險，在二十世紀演變為兩度引發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1930年代，採行中央計劃經濟的蘇俄共產主義和德意法西斯主義大行其道，左右翼極權政治的匯流，演變成二十世紀歐洲國家主義的兩大高潮。

關於現代極權國家的興起，德國法學家齊佩利烏斯 (Reinhold Zippelius) 指出：「『一戰』結束後，伴隨絕對的、缺乏妥協的意識形態的滋生，極權主義在全世界廣泛興起。作為現代極權國家的典型代表，蘇聯和納粹時代的德國都是國家涉入公民所有生活領域的模板。此類國家要求將它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均作用於公民的私人生活領域。」<sup>⑥</sup>

歐風東漸，一股極權國家主義浪潮在1930年代波及中土。德俄極權國家代西方民主國家而興，成為吸引中國思想界的新文明典範。百年中國思想史，伴隨着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頡頏衝突。尋求富強的中國知識份子，或以稱雄世界的盎格魯—撒克遜 (Anglo-Saxon) 文明為模式，或為後起的德國和蘇俄極權主義所誘惑，文明典範的衝突表徵着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風雲激蕩。弔詭的是，在二十世紀中國，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如影隨形，而中國的國家主義往往又從自由主義蛻變而來。二十世紀初，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 (Johann C. Bluntchli) 的國家主義曾經征服了崇尚英倫文明的梁啟超，使其從傾向自由民主而轉向國家主義之「開明專制」，成為中國國家主義之父。而國家主義帶來最深刻的挑戰，在於其對親英美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誘惑。1930年代，國家主義挾德俄極權主義之勢力，孕育了一批一向被視為「英美派」的「新獨裁派」<sup>⑦</sup>，並在自由派知識份子中引發了一場「民主與獨裁論戰」。

在二十世紀中國，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如影隨形，而中國的國家主義往往又從自由主義蛻變而來。國家主義帶來最深刻的挑戰，在於其對親英美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誘惑，並在自由派知識份子中引發了一場「民主與獨裁論戰」。

## 二 專制、武力統一與「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1930年代是世界歷史的多事之秋。隨着蘇俄計劃經濟的突進和德意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極權主義的大行其道使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黯然失色。在自由主義的故鄉，英國凱恩斯革命和美國羅斯福新政，以政府干預逆轉了放任主義的自由傳統。在中國，日本侵凌危機日亟。自1931年起，日本連續挑起東北「九一八事變」、上海「一二八事變」和熱河「華北事變」。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擊敗馮玉祥、閻錫山部以後，於1930至1933年連續發動五次圍剿江西中央蘇區的剿共戰爭。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聯合第三黨和國民黨內抗日反蔣勢力，於福州發動了「閩變」，宣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嚴峻的內憂外患和世界歷史的鉅變，激活了中國的國家主義，在思想界興起了一股籲求以專制實現國家統一和強力秩序的新專制主義思潮<sup>⑧</sup>。

1933年，在《獨立評論》社自由派知識份子之間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民主與獨裁論戰」。這場自由主義 (以胡適等民主派為代表人物) 與極權主義 (以蔣廷

黻、丁文江等新獨裁派為代表人物)之爭,由於其討論議題關乎重大的政治價值問題,因而成為民國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論爭之一。

當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蔣廷黻率先告別了自由主義,轉而擁抱專制主義。1933年5月,蔣於《獨立評論》第51號發表了〈知識階級與政治〉一文。該文指出,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議制民主在二十世紀已經過時。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可以當作學術研究,而不可當作實際政治主張。在政治後進的國家,改革方案免不了抄襲政治先進國家。在社會狀況和歷史背景相差不遠的國家之間,這種抄襲比較容易且少危險;相差太遠,則極難而又危險。以俄國為例,革命前俄國知識階級最有勢力的立憲民治黨曾提出一個西方式的政治方案,包括普選、議會主權、責任內閣、人權和民主。此方案與佔俄國人民80%的農民毫不相干,農民對議員、選舉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毫無興趣,他們所要的是土地,而這恰恰是立憲民治黨所忽視的。因而,儘管該黨人才濟濟而堪比英國自由黨,但他們在俄國卻不能生根。在俄國歷史上,彼黨唯一貢獻是為共產黨開了路,除此以外毫無作為。蔣認為,「中國的知識階級大可不必蹈俄國立憲民治黨的覆轍。」<sup>①</sup>

蔣廷黻進而主張,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國家統一,國家秩序高於一切,知識階級今日應無條件地擁護中央政府,促進國家建設:「中國不統一,內亂永不能免;內亂不免,軍隊永不能裁,而建設無從進行。……我們應該積極的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它是中央。我以為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縱使它不滿人望,比有三四個各自為政的好。」又指出:「只要有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國內的安寧,各種的事業——工業,商業,交通,教育——就自然而然的會進步。」<sup>②</sup>蔣的「專制統一論」宗旨,是建設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同年12月,蔣廷黻於《獨立評論》第80號發表〈革命與專制〉一文,引歐洲史論證專制為革命之前提。他強調,英國若不經過十六世紀都鐸(Tudor)王朝一百年的專制,就不可能有十七世紀的革命。法國若不經過波旁(Bourbon)王朝兩百年的專制,也不會有十八世紀的大革命。俄國若不經過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三百年的專制,也就沒有列寧的革命偉業。質言之,由專制造成的統一的民族國家,是革命的歷史前提。中國正處於英國未經都鐸專制、法國未經波旁專制、俄國未經羅曼諾夫專制以前一樣的形勢。中國現在只有內亂,不能有真正的革命。中國雖經幾千年專制,但仍是個朝代國家而非民族國家,而且中國專制君主未遺留可作為新政權中心的階級和像樣的物質文明。蔣的結論是:「總之,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談不到第二步。」<sup>③</sup>

蔣廷黻在其後回應胡適的批評時進一步強調,民族主義是近代世界潮流,各國都賴此提高中央權力。近代國家革命,其結果總是國家的統一鞏固和中央政府權力的提高,而中國革命卻導致了長期的割據內亂。因而中國政治的最低要求,是以個人專制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並用武力統一國家<sup>④</sup>。

未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芝加哥大學博士)吳景超在《獨立評論》第84號發表〈革命與建國〉一文,呼應蔣廷黻的專制統一論。根據中國內亂史的研究,吳總結了中國內亂的三個時期和八個階段:第一時期分苛政、人民不安、革

蔣廷黻強調,近代國家革命的結果總是國家的統一鞏固和中央政府權力的提高,而中國革命卻導致了長期的割據內亂。因而中國政治的最低要求,是以個人專制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並用武力統一國家。

命、現狀推翻四階段；第二時期分群雄爭權、統一完成二階段；第三時期有善政、和平恢復二階段。他認為，中國目前還處於第二時期的「群雄爭權」階段，在此時期內除了武力統一的方式外，別無他法<sup>⑩</sup>。

不過，吳景超對專制問題有所保留，他在後續的〈中國的政制問題〉一文中表示：「我在那篇文章〔〈革命與建國〉〕裏，討論的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或技術問題，而贊成獨裁與否，乃是一個價值問題，決不可混為一談。關於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選擇，我與胡適之先生的意見是相同的，我們贊成民主政治。」<sup>⑪</sup>這表明吳在論爭中的折中態度。

蔣吳二氏的「專制武力統一論」，以國家建構為宗旨，崇尚國家權力秩序至上，支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主張無條件地擁護黨國領袖和中央政府，以武力和中央集權的鐵腕專制克服分崩離析的內亂，實現國家統一，建設強大政府。對他們來說，專制最有利於實現國家統一和建設強力政府。

蔣廷黻親政府的國家主義論調深受當局欣賞。1935年，他應蔣介石之邀離開清華園而棄文從政，入閣南京國民政府政治中樞，出任蔣介石（行政院長）內閣的行政院政務處長，與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另一位清華地質學教授翁文灝，成為蔣介石政府的兩位最高幕僚。同年，吳景超亦隨翁赴南京，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參事等職。

### 三 極權利於富強，福利高於自由

1934年初，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學博士）錢端升在《東方雜誌》撰文〈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頌揚獨裁極權，反對民主憲政。這位政治學家提出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觀點：獨裁制度乃大勢所趨，極權國家最有利於實現中國的富強。他強調指出：「我所敢言的只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State）。」<sup>⑫</sup>錢端升心儀極權國家實現富強的高效率，在他看來，獨裁並不可怕，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並不輸於民主。獨裁既能為大多數人增進福利，又怎能因少數人的自由被剝奪，而非要維持謀福利不及獨裁的民主？中國需要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者。中國急需在最短時期內成為一個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欲達到沿海各省工業化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具有這種力量，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錢強調，「一切制度本是有時代性的。……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這些人對於反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sup>⑬</sup>

對於錢端升來說，極權國家的正當性在於：一是獨裁制度具有優於民主政治的行政效能，它最有利於中國快速工業化而發展為強大國家；二是極權國家有利於增進大多數人的福利，而為了大多數人的福利而犧牲少數人的自由在所不惜。顯然，錢的「極權強國論」比蔣廷黻的「專制統一論」更具挑戰性，當極權

錢端升心儀極權國家實現富強的高效率，在他看來，獨裁並不可怕，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並不輸於民主。中國急需在最短時期內成為一個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欲達到沿海各省工業化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的力量不可。

當極權國家與中國快速工業化和大眾福祉相聯繫時，這種融發展主義、民粹主義於一體的極權主義，對一個後發展國家來說無疑是最具魔力的意識形態。錢端升坦承他為了中國的富強而放棄自己經久薰陶而形成的民主信念。

國家與中國快速工業化和大眾福祉相聯繫時，這種融發展主義、民粹主義於一體的極權主義，對一個後發展國家來說無疑是最具魔力的意識形態。尤其是錢氏坦承他為了中國的富強而放棄自己經久薰陶而形成的民主信念，其言辭之懇切，甚至令論敵胡適為之動容，胡稱讚錢文為民主與獨裁討論中一篇「最有條理又最懇摯動人的文章」<sup>⑩</sup>。在1930年代德俄極權與中國危機的語境中，錢的極權強國論無疑發出了國家主義最強音。

同年12月18日，《獨立評論》另一發起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在《大公報》發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鼓吹「新式獨裁」，使「民主與獨裁論戰」再起波瀾。這位留英出身（格拉斯哥大學地質學動物學雙學士）的中國地質學開山祖，批評胡適的「民主幼稚觀」是「不可通的」。他認為，中華民國的人民大多數不識字，不識字的人不能行使選舉權，因而中國「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而且「事實上看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制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中國應當「試行新式獨裁」<sup>⑪</sup>。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宜實行獨裁制，這是新獨裁派的又一核心觀點。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在回應胡適來信的〈再論民治與獨裁〉一文中重申：「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新式的獨裁。」丁所設想的「新式獨裁」須具有四個條件：「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sup>⑫</sup>丁呼喚的這種完全代表國家利益、徹底了解現代化性質、能夠動員全國人才的新式獨裁領袖，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現代獨裁者」<sup>⑬</sup>，一個理想的現代魅力型領袖。

丁文江理想中的「新式獨裁」並非國民黨那樣的假專制。他強調：「中國的專制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專制的利益。」專制利害並存，專制之害是人民飽受奴役，專制之利則是國家的強大效能。丁的結論是：「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他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sup>⑭</sup>

這位留英出身的科學家坦承自己對於民主與獨裁取捨的複雜心緒<sup>⑮</sup>：

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裏，我曾問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

丁文江既是一個崇尚自由的知識份子，也是一個懷抱科學救國理想的愛國者。因而儘管他熱愛自由，但仍會選擇做一個極權國家的地質技師。

對於蘇俄，丁文江感情複雜。1933年春去俄前夕，他曾撰文嚴厲批評蘇俄的共產主義制度：「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權力和金錢一

樣，是很可怕的毒藥。……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自由是人類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卻，很難取得的。」儘管如此，丁對蘇俄仍不失希望：「我雖不贊成共產主義，我卻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產是一個空前大試驗。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劇？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sup>②6</sup>丁的經濟平等理想，是其思想左轉的一大動因。

1933年夏，丁文江在參加華盛頓國際地質學會大會後，取道歐洲，訪遊德俄二國。其四十天蘇俄之旅，加深了他對蘇俄的同情。蘇俄科技的高速發展激發了這位中國科學家強烈的愛國熱情，他激賞蘇俄計劃經濟超大規模的建設事業，尤心儀蘇俄地質探礦聯合局比中國地質調查所人員經費多一百多倍的規模，並且深為蘇俄全力追求世界第一工業國的氣象所嘆服。這也是他轉而青睞俄德「新式獨裁」的基本理由。丁的自由信念終不敵他的國家富強和經濟平等理想。

錢端升的「極權強國論」和丁文江的「新式獨裁論」，以極權主義有助實現國家富強為理據。他們心儀俄德極權國家之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高效率，主張以極權國家的「新式獨裁」強力推進中國工業化，實現中國復興的富強之夢。對他們來說，民主和獨裁都是手段，而獨裁則是二十世紀政治發展的大勢所趨和中國實現富強的最有效路徑。

## 四 民主派的批評：康莊大道與旁門左道

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胡適是捍衛民主政治的自由派旗手。反諷的是，胡和論敵蔣廷黻、丁文江為老友，三者同為《獨立評論》的創辦人。在極權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胡適力挽狂瀾，成為不合時宜的民主衛士。

1933年，胡適在《獨立評論》第82號發表〈再論建國與專制〉一文，反駁蔣廷黻的專制統一論<sup>②7</sup>：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甚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

胡適的「民主幼稚觀」是其反對專制獨裁的主要民主理論。

其後，胡適又在《獨立評論》第85、86號連續刊出〈武力統一論〉和〈政治統一的途徑〉兩文，以「民主統一論」回應蔣吳二氏的「專制武力統一論」。胡適指出，這二十年來統一難成，毛病不在軍閥，而在當前中國的意識形態衝突和疆域遼闊導致的交通不便，不容許內戰和中央軍西征南伐實現武力統一<sup>②8</sup>。他相信，只

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胡適是捍衛民主政治的自由派旗手。反諷的是，胡和論敵蔣廷黻、丁文江為老友，三者同為《獨立評論》的創辦人。在極權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胡適成為不合時宜的民主衛士。他的「民主幼稚觀」是其反對專制獨裁的主要民主理論。

有民主政治才是現代國家統一最有效的方法，認為今日中國必須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相聯貫的中央政治制度，如國會。「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聯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徵，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幫助中央統治全國。這是國會的根​​本意義。」<sup>28</sup>1934年12月，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30號撰文〈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文中借用新近汪精衛和蔣介石聯合通電中「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一語<sup>29</sup>，回應蔣廷黻和錢端升等人的專制論述。

山西大學教授、中國青年黨領袖常燕生是論爭中胡適為數不多的民主派盟友之一，1934年2月，他在《獨立評論》第88號發表〈建國問題平議〉，反對武力統一和專制獨裁。常認為，中國自古是一個無治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自古是一個無治主義的民族，其服從領袖的心、崇拜英雄的心、遵守紀律的心都有限。在今日中國，希望任何形式的專制可以成功，皆純屬夢想。中國的統一必須從民意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並在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sup>30</sup>。令人驚異的是，作為國家主義政黨之領袖，常燕生卻沒有追隨新獨裁派，而是堅定地支持民主政治。

1935年元旦，胡適應約於《東方雜誌》發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在這篇論爭綜述中，胡對錢端升的極權強國論作出回應：一、歐戰以來，民主政治不僅沒有衰落，而且其量與質都有長足發展。蘇俄政治實為民主政治的社會化，十八世紀的民主主義和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並非兩個相反的潮流，乃是民治運動兩大連續的階段。二、關於經濟民族主義，世界上唯有美俄英三國在天然富源和經濟組織上具備經濟民族主義的資格，其次是日意法德四國，中國並不具備經濟民族主義的資格。歐洲諸小國的自由組合的合作制度，是一種無需獨裁政治的計劃經濟；而晚近英美行政權力的增高，則是一種救濟經濟恐慌的社會化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sup>31</sup>。

胡適強調指出，錢的理論闕失，一是其「民主政治」定義過於狹窄，而不能承認歐洲後民主政治的發展；二是其「經濟民族主義」含義過於寬泛，故武斷地認為任何國家都不能免於統制經濟和獨裁政制。最後，胡適質疑以工業化為中國獨裁的理由，他認為沿海各省不具有工業化的條件，而且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單靠政府權力的無限增加。無限的權力不能平添資本、人才和改變民族習慣，故中國獨裁論並無充足的理由<sup>32</sup>。胡適對新式獨裁論提出詰難，但其民主辯護卻將蘇俄及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混為一談，其「民主政治社會化」的調和論不啻取消了民主與獨裁的本質差異；而對於中國工業化問題，他顯然亦未能有力地回應錢的極權強國論。

在該文中，胡適重申他的「民主幼稚論」，以反擊丁文江的「新式獨裁論」<sup>33</sup>：

我近年觀察考慮的結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於不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於可以訓練多數平凡的人參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選舉權的公民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這種能力是不難訓練

胡適對新式獨裁論提出詰難，但其民主辯護卻將蘇俄及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混為一談，其「民主政治社會化」的調和論不啻取消了民主與獨裁的本質差異；而對於中國工業化問題，他顯然亦未能有力地回應錢端升的極權強國論。

的。……可是近十年中起來的現代獨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國現時)就大不同了。這種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於政權的集中與弘大，而在於充分集中專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個完全技術的機關，把政治變成一種最複雜紛繁的專門技術事業，用計日程功的方法來經營國家人民的福利。

胡適強調，獨裁政治遠遠難於民主政治，中國學不了俄意「新式獨裁」，後者所需的高等智囊團和數百萬專門人才，以俄意古老的大學傳統為支撐。

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張奚若(字熙若)，1935年1月13日於《大公報》發表〈獨裁與國難〉，反駁蔣廷黻的專制統一論。張指出：獨裁絕不能達到紓解國難的目的，其最大原因是有自由、平等、個人解放等新時代的思想在作梗。若用專制手段對付新思想，只能取得一時成功。英國亨利七世(Henry VII)和法國亨利四世(Henri IV)的專制，是由於彼時民主思想尚未發達，這種專制不可能行於二十世紀。國難當頭，為應付危機起見，本可暫時集中一切政治軍事權，這與獨裁政制無關。「一時權力集中是一事，正式的、永久的獨裁政制又是一事」，「這都不能與建設一個正式的獨裁政制混為一談。」新獨裁派「被一種希望全知全能的獨裁者出世的『願望』佔據了他們的意識，使他們覺得這種空中樓閣總不會像是空中樓閣」<sup>④</sup>。

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張奚若在《獨立評論》發表〈我為甚麼相信民治〉，從政治價值上為民主辯護。他強調：民主是「至現時止，所發明的最高明的政治制度」。以「被治者的同意」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是以理服人的制度，專制則是以力服人的制度，而理比力在價值和道德上更高一等。「這是我贊成民治的最要理由。」「我相信民主政治的最要理由就是因為它是一種值得學的東西。別的政治制度，就是容易學，若不值得，也不必學。這是一個價值問題，不應忽略過去。」<sup>⑤</sup>張樂觀地堅信：「民治在大體上又是今日政治上的康莊大道，其他炫耀一時的政制都是旁門左道，不久還歸失敗，不足以為法。」<sup>⑥</sup>

胡適等民主派知識份子面對極權主義的狂飆，不為時代潮流所惑，堅定地護持自由民主的價值。胡適以「民主幼稚論」駁斥新獨裁派的「國民素質論」，但尚未擊中其「極權強國論」的要害。張奚若以現代文明的政治價值為民主辯護，並預言極權主義的「旁門左道」終將失敗，顯然更具理論深度和歷史洞見，但卻無力回應新獨裁派對國家富強的籲求。

張奚若以現代文明的政治價值為民主辯護，他樂觀地堅信，民主政治是今日政治上的「康莊大道」，並預言極權主義的「旁門左道」終將失敗，顯然更具理論深度和歷史洞見，但卻無力回應新獨裁派對國家富強的籲求。

## 五 國家主義的迷思

國家主義思潮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一個耐人尋味的思想史現象。自世紀初梁啟超倡言伯倫理式國家主義始，20年代的醒獅派、30年代的新獨裁派、40年代的戰國策派等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思潮此起彼伏，不絕如縷。而且，晚清以降國家主義思潮的流變呈激進化之勢，梁氏和醒獅派的國家主義尚具有調和自由主義的傾向，而新獨裁派的國家主義則以反自由民主的極權主義相標榜。

阿倫特(Hannah Arendt)指出：「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裏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sup>⑦</sup>然而，在1930年代的中國，為甚麼一群清一

色的英美派教授會倒向危險的極權國家主義的懷抱？極權的國家主義究竟有何種魔力，可以誘使這些曾經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轉而擁抱獨裁專制？

關於民國以來獨裁和民主逆轉的原因，胡適的分析不無哀惋<sup>⑨</sup>：

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欽羨的政治制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政治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意大利的專制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制抱着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蘇俄的一階級專政，或者意大利的一黨專政。

在胡適看來，中國民主憲政的無望和德意俄極權主義的榜樣，是思想界中「新式獨裁」思想興起的主要原因。

國家主義是一種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後啟蒙意識形態。在國家主義中，「國家」替換了「朝廷」，其與王權主義一脈相承的威權崇拜裹上了一層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發展主義的現代外衣，因而可以滿足後進國家人們的多重心理需求。而且，國家主義作為一種後發展政治理論，因有德國和蘇俄成為後來居上的大國崛起的理論先導，而獨具強大的思想魔力。在國難當頭的1930年代，日寇侵凌的危機、歐洲極權的誘惑、追求富強的悲情，刺激了中國極權國家主義思潮的興起。

新獨裁派的國家主義是一個現代意識形態大雜燴，它熔極權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發展主義、民粹主義於一爐，因而對危機中的思想界極具誘惑力。蔣廷黻、吳景超膜拜鐵腕威權和秩序至上的保守主義，錢端升、丁文江倡言以獨裁的極權國家推動工業化的發展主義以及大眾福利高於少數人自由的民粹主義，均表徵着國家主義對中國問題的多重回應。為了國家的統一富強，這些曾經飽受英美文明薰陶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不惜拋棄自由民主，轉而乞靈於武力、專制、獨裁的極權國家。需要指出的是，新獨裁派並非冥頑不靈的保守派，而是忠誠的愛國者。他們以往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更多是工具性的，而缺乏對其內在價值的信仰。對這些信奉國家利益至上的知識份子來說，民主與獨裁都是手段，國家富強才是終極目的。極權主義的誘惑，最易俘獲後發展國家知識份子渴求富強的民族主義激情。因而當風雲突變之際，他們的民主信念產生動搖就不足為奇了。

新獨裁派的主張，浮現了百年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一套蠱惑人心的主流話語：國家意志與利益高於一切；中國需要全知全能的魅力型獨裁領袖；中央集權的強力秩序是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必須無條件地擁護中央政府的權威；以富國強兵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極權國家的「新式獨裁」是中國達致富強的最有效路徑；極權國家更有利於大眾福利；為大眾福利而犧牲少數人的自由在所不惜。新獨裁派這套國家主義話語，在百年中國趕超西方的現代化歷程中歷久不衰，根深蒂固。現代中國的國家焦慮、富強悲情和極權誘惑，為國家主義的滋長提供了恆久的心理溫牀。

獨裁政治是二十世紀對自由主義最具挑戰性的政治制度。誠如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華特金斯 (Frederick M. Watkins) 所言：獨裁制度是對自由主義原則的

新獨裁派並非冥頑不靈的保守派，而是忠誠的愛國者。他們以往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更多是工具性的，而缺乏對其內在價值的信仰。對這些信奉國家利益至上的知識份子來說，民主與獨裁都是手段，國家富強才是終極目的。

直接挑戰，極權的獨裁制甚至攻擊到憲政民主體制的最後防線。「極權主義的興起與國族主義的興起一樣，都是近代自由主義理論與實際弱點的反映，一廂情願的想法使許多自由主義者無法看清這個基本事實。」<sup>③</sup>西方民主制的一大弱點，是權力制衡下憲政政府之決策效能的低下，它受到極權政治的嚴峻挑戰。在華氏看來，獨裁政治對於非西方民族的誘惑，尤在其快速現代化的高效率。他指出：「將經濟、社會決策置於民主選民意志下的政治體系，很難和快速現代化結合。……歷史已經證明獨裁政治，無論是早期的殖民主義或近代的極權主義形式，是把西方科技移植給非歐民族最有效的方法。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區，工業近代化的壓力或許會逼使獨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繼續成為主要的政府形式。」<sup>④</sup>

這番關於獨裁政治的發展主義詮釋，即獨裁制度與非西方發展型國家具有親和性的觀點，極富歷史洞見。這也是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以外難敵獨裁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獨裁政治之於迅速工業化的優勢，也是錢端升、丁文江等人對獨裁制度情有獨鍾的原因所在。惜乎胡適等自由派並未正視並回應這一問題。

國家主義是一種反啟蒙的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之理論要害，是其國家至上的國家崇拜觀。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為保障公民自由和幸福而設，由官吏組成的政府是「必要的惡」。馬克思主義將國家歸為建基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和階級統治的工具。在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是公民或階級的政治工具。而國家主義則將國家神聖化，視其為神的化身和最高的善，國家有機體具有自身獨立而神聖的意志，個人只是國家機器中微不足道的部件和螺絲釘。這種以權力吞噬權利的國家神話，由於其完全違反啟蒙精神而淪為王權主義的現代翻版。

國家主義的另一迷思是富強主義。「富強」是百年中國回應列強軍事經濟壓力的改革訴求和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但經濟和軍事的發展並不是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即使在晚清洋務派那裏，「富強」亦只屬於器物之「用」的進步。這種器物的現代化，需要現代文明的價值和制度與之匹配，價值和制度方為現代文明之「體」。具有憲政民主制度和自由人道精神的現代國家，其國力的富強為文明的富強；而德俄意日之反民主、反人道的極權現代化模式，則為野蠻的富強，其炫惑一時的「另類現代性」終究屬於荊棘叢生的旁門左道。

百年中國由於西力東侵而走上現代化之路的悲情歷史，古老帝國軍事經濟失敗所激發的富強情結，是滋生國家主義的天然土壤。而國家主義之反啟蒙的富強道路，則潛藏着危險的陷阱。胡適對日本軍國主義模式的危險性有清醒的警覺。1933年，他在芝加哥大學所作「當代中國的文化走向」的演講中指出，日本「中央控制型」的文化調整模式，在統治階級控制下推行了全國大規模的改革，迅速實現了富強。日本模式利弊互見，它將外來文化之枝嫁接於日本傳統之幹上，許多中世紀傳統受到了軍事現代化強硬外殼的保護。受保護的東西中確有許多瑰麗而具有永恆價值的遺產，但也有不少原始的、孕育着火山爆發般危險的東西<sup>⑤</sup>。

新獨裁派為了國家富強而擁抱獨裁的極權政治，猶如飲鴆止渴。令其始料未及的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新路卻是一條通往「古拉格群島」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毀滅之路。1944年末，時值盟軍戰勝法西斯主義前夜，當身居國府要職的蔣廷黻因公重訪闊別二十多年的美國時，其思想中隱伏的自由主義信念被再度激

國家主義的迷思之一是富強主義。「富強」是百年中國回應列強軍事經濟壓力的改革訴求和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但經濟和軍事的發展並不是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器物的現代化需要現代文明的價值和制度與之匹配。

活。回國後，這位當年新獨裁派的始作俑者轉而如夢初醒地禮讚自由：「一個有政治自由的國家固然不能說就是天堂，一個無政治自由的國家確是地獄了！」<sup>42</sup>

風雲激蕩的二十世紀歷史，證明了張奚若抗戰前夜的偉大預言：民主是今日政治上的康莊大道，德俄意極權帝國曾經炫耀一時的旁門左道，已經煙飛灰滅。八十多年前的「民主與獨裁論戰」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思考：自由民主究竟具有內在價值，還是僅僅是一種工具性的政治制度？政治的終極價值是國家的富強，還是每一個公民的自由與福祉？中國如何走一條後發展的政治道路？

## 六 結語

毋庸置疑，國家建構對於後發展政治尤其重要意義。政治學者阿爾蒙德 (Gabriel A. Almond) 將政府權能和民主參與歸為政治發展的兩大目標。他指出：「政府的權力和效能，和公眾對政府影響的程度，是兩個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政治發展指國家的發展和國家的民主化。」<sup>43</sup>建設具有高度政府權能的強大國家，是政治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對於具有悠久的強國家傳統的中國來說，自由和市民社會傳統的匱缺，使其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國家主權獨立和工業化的新挑戰。因而，建構強大的現代國家，對於後發展中國意義尤為重要。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初民時代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中，從世界歷史中歸納出良好政治秩序的三大關鍵要素：國家 (state)、法治 (rule of law) 和問責政府 (accountable government)。在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政體中，三種制度元素結合成穩定的平衡狀態<sup>44</sup>。在福山看來，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十一世紀羅馬天主教會的宗教革命和十七世紀英國的憲制改革，分別表徵着強國家、法治和問責政府的興起。十七世紀經歷內戰後的英國是人類歷史上首度集三種政治秩序要素之大成的國家。雖然中國早在秦朝已確立現代國家的形態，當代中國的政治秩序擁有源遠流長的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但其仍缺乏法治和問責制度。

按照福山的理論，健全的現代政治秩序，是強國家與法治、民主三位一體的制度。德俄意日之極權國家取強國家而棄法治和民主，無疑走了一條顧此失彼的危險之路。窒息自由的極權政治猶如一輛具有強大引擎卻缺乏制動的快車，車速愈快則愈危險。而中國政治的利鈍得失，皆在中央集權的秦始皇傳統。中國政治發展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創造性地轉化中華帝國古老的強國家遺產，並建構法治和民主問責制度，以達致長治久安之「強國家與強社會」的現代政治秩序。此為中國通往文明而富強的康莊大道。

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成就了舉世驚嘆的經濟奇迹，但「硬政治、軟經濟」的改革所造就的「市場巨靈」(「市場利維坦」)，以及其「國家市場經濟」的國家壟斷、貧富分化和社會衝突之弊，仍未脫後全能政治的深刻困境。法治和民主，依然是新世紀轉型中國的最大挑戰。隨着中國的崛起，在晚近的「中國模式」大合唱中，左右翼國家主義思潮故態復萌，國家神話、富強至上、極權強國等陳詞濫調又「似曾相識燕歸來」。今天重溫1930年代「新式獨裁」興起的歷史，可以史為鑒。

中國政治發展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創造性地轉化中華帝國古老的強國家遺產，並建構法治和民主問責制度，以達致長治久安之「強國家與強社會」的現代政治秩序。此為中國通往文明而富強的康莊大道。

## 註釋

- ①⑤⑥⑦ 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張國忠譯：《國家的神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304；294-98；300-301；305。
- ②③④ 參見黑格爾(Georg W. F. Hegel)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253、259、271；254、268、293；287、306。
- ⑧ 齊佩利烏斯(Reinhold Zippelius)著，趙宏譯：《德國國家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頁341。
- ⑨ 「新獨裁派」，由1930年代丁文江等主張「新式獨裁」而得名。
- ⑩ 新專制主義指民國時代的專制主義，以區別於王朝時代的舊專制主義。
- ⑪⑫ 蔣廷黻：〈知識階級與政治〉，載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三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664-66；666。
- ⑬ 蔣廷黻：〈革命與專制〉，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三卷，頁673。
- ⑭ 蔣廷黻：〈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83號，1933年12月31日，頁2-6。
- ⑮ 吳景超：〈革命與建國〉，引自胡適：〈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515。
- ⑯ 吳景超：〈中國的政制問題〉，《大公報》，1934年12月30日。
- ⑰⑱ 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引自胡適：〈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頁510-11；511。
- ⑲⑳㉑㉒ 胡適：〈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頁511；512-14；512-14；509。
- ㉓ 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大公報》，1934年12月18日。
- ㉔㉕㉖ 丁文江：〈再論民治與獨裁〉，《大公報》，1935年1月20日。
- ㉗㉘ 張熙若：〈獨裁與國難〉，《大公報》，1935年1月13日。
- ㉙ 丁文江：〈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引自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七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520-21。
- ㉚㉛ 胡適：〈再論建國與專制〉，載《胡適文集》，第十一冊，頁375-77；375。
- ㉜ 胡適：〈武力統一論〉，載《胡適文集》，第十一冊，頁387-94。
- ㉝ 胡適：〈政治統一的途徑〉，載《胡適文集》，第十一冊，頁400。
- ㉞ 胡適：〈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載《胡適文集》，第十一冊，頁501。
- ㉟ 常燕生：〈建國問題平議〉，引自胡適：〈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頁517-18。
- ㊱ 張熙若：〈我為甚麼相信民治〉，《獨立評論》，第240號，1937年6月27日，頁2-5。
- ㊲ 張熙若：〈國民人格之培養〉，《獨立評論》，第150號，1935年5月12日，頁16。
- ㊳ 〈初版序〉，載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3。
- ㊴㊵ 華特金斯(Frederick M. Watkins)著，李豐斌譯：《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219；263。
- ㊶ 胡適著，歐陽哲生、劉紅中編：《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頁167-68。
- ㊷ 蔣廷黻：〈觀美國並回觀祖國〉，《大公報》(重慶)，1944年12月17日。
- ㊸ 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著，林華、張彤譯：〈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等著，張景明譯：《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頁362。
- ㊹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16.